



文艺评论

事上练 事上写 事上成

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序

郗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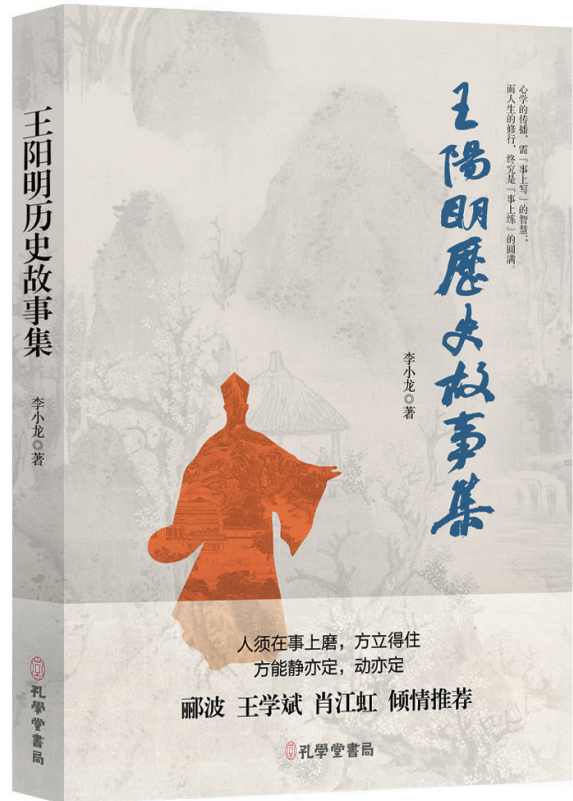
研读阳明心学数十载，常有人问我：500多年前的先哲智慧，如何照进当下的琐碎日常？其实答案早已藏在阳明先生的践行里——“人须在事上磨，方立得住；方能静亦定，动亦定”。当读到李小龙先生新著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，我心中豁然有悟：原来心学的传播，亦需“事上写”的智慧；而人生的修行，终究是“事上练”的圆满。

阳明心学最动人处，从来不在玄奥的哲思空谈，而在扎根于现实土壤的生命实践。阳明先生一生波澜壮阔，从京城上书被贬龙场，到贵州悟道创立阳明心学；从南赣剿匪安定一方，到平定宁王叛乱挽救危局；从归乡讲学启迪群蒙，到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一桩桩、一件件事迹，不是点缀生平的注脚，而是阳明心学思想最鲜活的注疏。“心即理”不是书房里的冥想，是龙场寒窟中“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”的豁然开朗。“知行合一”不是口头上的标榜，是南赣治盗时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的躬身践行。“致良知”不是抽象的道德律令，是平定宸濠之乱时临危不乱、坚守本心的从容决断。脱离了这些具体的事，心学便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唯有在事境中淬炼，良知的的光芒才能穿透私欲的遮蔽，照见生命的本真。

小龙深谙此道，这部著作最可贵之处，正在于“事上写”的创作初心。他没有堆砌晦涩的理论阐释，也没有纠结于学术考究的繁琐辨析，而是以阳明先生的生平事迹、诗文创作为脉络，将龙场悟道的孤寂、南赣剿匪的坚韧、讲学授徒的热忱一一铺陈。那些看似寻常的生命片段，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可感。我们能读到先生贬谪途中的艰辛与坚守，体会他“险夷原不滞胸中，何异浮云过太空”的豁达。我们能看见他在地方治理中“宽严相济”的智慧，明白“为政之道，在于安民。安民之要，在于致良知”的真谛。我们更能感受到他面对生死抉择时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的坦荡。

这种“事上写”的笔法，恰恰暗合了心学“知行合一”的精髓。故事的字里行间，没有刻意说教，却让读者在品读事迹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体悟到“事上练”的深意。当我们看到阳明先生在龙场的绝境中依然讲学不辍，便懂得“困厄是最好的修行”。当我们了解他在复杂的军政事务中始终坚守良知，便明白“初心是最难的坚守”。正如先生所言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小龙以事为载体，让读者在读事过程中知理，在知理之后践行，这种以事传理、以行证知的传播方式，远比单纯的理论灌输更具感染力。

当下的我们，身处信息碎片化、节奏高速化的时代，常常陷入“知易行难”的困境：明白熬夜伤身却依旧作息紊乱，懂得孝顺父母却总因忙碌疏于陪伴，知晓努力精进却难以抵御惰性诱惑。这正是阳明先生早已警示的“知行分离”之弊。而这部故事集，恰如一面镜子，照见我们自身的症结；又如一座桥梁，跨越天堑，连接起理论与实践。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，而是在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中打磨心性、锤炼品格。所谓“事上练”，练的不是外在的技能，而是内在的定力。所谓“心上学”，修的不是他人的认可，而是内心的良知。



图书《王阳明历史故事集》。

人生在世，谁不是在事中沉浮，在练中成长？阳明先生主张“磨镜明心”，弟子徐爱领悟说：“心犹镜也，圣人心如明镜，常人心如昏镜。”常人心如明镜蒙尘，而擦拭尘埃的过程，便是在事上磨练的过程。正如小龙在书中所展现的，阳明先生的伟大，不在于他经历困境，而在于他能在困境中坚守本心；不在于他毫无私欲，而在于他能在事上克己复礼。这种在人间烟火中修行、在具体事务中精进的生命态度，正是心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阳明先生的智慧，如龙场的暖阳与清风，穿越500多年的时光，依然照拂着今天的我们。小龙久居龙场，得地利之便，又以“事上写”的笔法，让心学智慧变得通俗易懂、可感可学。而我们每一个读者，更应秉持“事上练”的初心，在各自的生活中践行良知、锤炼品格。愿我们都能在这部书的启迪下，于世事沉浮中坚守本心，于日常磨砺中成就自我。须知，生命的真谛不在远方的空想里，而在当下的每一件事、每一次选择、每一次坚守中。所谓人生圆满，不过是在事上练心，在心上成事，最终活成“此心光明”的模样。

（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南京明清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嘉宾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嘉宾）

乡土的情感记忆及现实表达

小说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片论

于发成

“山那边”是什么？对于世代居住在贵州大山褶皱里的彝族、苗族人家而言，山那边还是山。曾经山是石旮旯里种不出好庄稼的薄土，是雨后滚落的石头，是难产妇人等不到救护车的长夜。然而在戴时昌的长篇小说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中，“山那边”已不是同样困顿的山，而是一座名为“太阳小镇”的安置新区，是当代乡土变迁的一个具象化落脚点。小说以大山乡党委书记文安松到任为起点，以乡长陈红云的坎坷身世为暗线，铺陈了整乡搬迁动员工作中的冲突与和解。这部作品试图用小说的形式为一段基层实践立传，其素材来自作者对黔西南这片土地的观察，其情感脉络则与当下乡土中国的集体记忆紧密缠绕。

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充分展示了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生活的碰撞。杨永林搬迁到太阳小镇后虔诚地对着家祖念有词，“皱纹就挤到了眼角，鼻孔酸酸的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”。这种情感的复杂层次，不是单纯的“告别贫穷拥抱幸福”的线性叙事所能容纳的。当一个人离开土地、离开祖先坟茔、离开与之关联的生活方式之后，他获得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小说没有回避这一追问。刘开国梦见父亲，执意搬回老家照顾坟茔，拿镰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吼着“谁拦我就死给谁看”——那些石旮旯里的坟堆，在老一辈心中不是死人的家，而是活人的根。而他最终在父亲坟前磕头表态“爸，这家我搬了”，是在一种近乎与亡父诀别的方式中完成的。那一刻的“一家人笑起来”，既是对新生活的拥抱，也暗含着一代人与故土的告别。这种双重性赋予了小说的情感厚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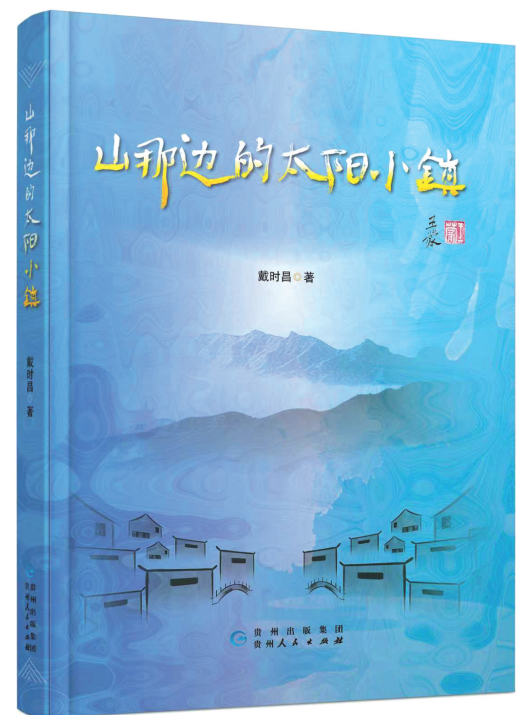
值得注意的还有吴尚美这个角色。作为苗医，她掌握祖传接骨技艺，能用草药和手法治愈当地病患，却没有行医资格证，只能“悄悄帮人治疗”。这体现了传统乡土知识的有效性在现实中遭遇的合法性困境。而文安松支持她在太阳小镇开设中医馆，并承诺帮她通过考试获得合法资格；吴尚美后来将技艺传授给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罗定赢，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师徒关系中达成了和解。小说结尾处，旅游公司在大山乡整乡搬迁遗址经营民宿、探洞、攀岩项目，山地不再作为居住地，而是作为体验地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这种体验与居住之间的转换，正是这部小说在思想层面上最具时代特征的思考的体现。

在叙事结构上，一方面，小说以文安松到任为起点，以整乡搬迁的完成为终点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闭环，另一方面，小说在这一主干线之外穿插了大量倒叙、插叙、多人讲述的段落，使得叙事富有层次感。陈红云的故事是理解这一结构的关键。小说在第一章结尾安排陈红云向文安松讲述自己的身世，随即铺陈其成长轨迹：从出生那天傍晚的火烧云（由此引出“红云”），到未出生即被许配给表哥的婚约，到14岁时连夜逃婚，到在羊肉馆打工并被校长徐永盛资助读书，最终考上大学回乡。这段叙事赋予了整部小说一种追忆的底色——它让读者意识到，眼前这位干练的女乡长，是从怎样泥泞的命运中一步步走出来的。这种个人史与乡村史的交织，使得搬迁动员的情节具有了分量，陈红云说服老乡搬迁，本质上是在说服他们走一条她自己走过并且证明正确的路。

这种追忆并非陈红云一人独有。陈再旺夫妇回忆女儿出生的场景、刘兴会在搬迁动员时回忆儿媳妇难产死亡的惨痛、罗大进讲述尾景组泥石流往事……这些回忆段落以独立章节的形式呈现，与主线情节形成复调式的对话关系。如果说主线是关于未来的，那么这些回忆性段落则构成了过去，以碎片化的方式拼贴出一幅山地生存困境的全景图。这种结构设计使得小说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，读者在跟随搬迁进程的同时，也不断被拉回到那些导致搬迁成为必要的深层原因之中。小说在叙事时间上还有一种忽快忽慢的韵律感：动员阶段节奏缓慢而稠密，充满对话与情感挣扎；实施阶段节奏明显加快。这种变化对应着一种叙事逻辑：障碍值得详述，而顺利的进展可以被压缩。结尾以陈家三兄妹回到老家、与文安松等人意外相遇、百余名老乡聚集拍摄合影而收束，具有全景式的完成感。

戴时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，代表作曾多次获得省级重要文学奖项。他的报告文学“不是把大量的采访材料原封不动地照搬，而是将这些材料化为自己的情感，在遴选、重组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其间”。这一特征在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中同样可见，大量人物可以找到现实生活的影子，泥石流灾害的描述、搬迁动员的日常细节，都得益于作者对基层工作的扎实的了解。当报告文学的素材处理方式被运用于长篇小说时，其优势在于叙事的真实感和细节的丰满度。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成功地将报告文学的素材积累转化为长篇叙事的情节资源，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框架内，呈现了整乡搬迁这一复杂过程。戴时昌以其对山地生活的深厚情感和对基层工作的深刻理解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告别与新生、困惑与希望相互交织的图景。人与土地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脐带，永远值得被讲述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研究员，作家）



图书《山那边的太阳小镇》。

舞剧《王阳明》：对传统文化的先锋表达

杨林

在贵州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、阳明文化转化运用、民族文化传播弘扬、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“四大文化工程”的背景下，如何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新枝，如何让地域文化摆脱“背景板”的尴尬，成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化IP，一直是贵州文艺工作者努力破解的课题。

贵州，阳明心学的诞生地，原创舞剧《王阳明》正是将这个“精神产床”搬上舞台。剧目在国家大剧院、上海国际艺术节、长江艺术节、多彩贵州艺术节等高端平台展示，以及在全国10余省市巡演。这部由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旅游局指导，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出品，贵州省歌舞剧院制作、演出的舞台艺术作品，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，更是贵州推进“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”的力作。它以一种契合时代的先锋表达，生动地回答了“心学何以生于贵州”的文化之问，“阳明文化如何舞台呈现”的艺术之问，传统与现代的代际之间、作品与产业的融合之作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一有益探索。



舞剧《王阳明》剧照。

演绎“心学何以生于贵州”

“四大文化工程”强调文化的在地性。王阳明悟道在贵州，舞剧《王阳明》用舞蹈艺术表达，没有贵州人和地域的滋养，就没有阳明心学。该剧将贵州的山水、民族与人文环境从背景提升为角色。并未简单堆砌少数民族元素，而是将贵州的大地之美注入舞蹈肌理。剧中，贬谪路上的走板、龙场的溶洞、百姓的载歌载舞，不是单纯的民俗展演，不是单纯环境交代，而是通过节奏的变化、演员重心的下沉，赋予剧目大地之力，成为王阳明精神突围的催化剂。

特别是剧中展现王阳明与百姓关系的群舞：山民踏歌建房、苗女以酒抚慰、围坐听学等场景，通过质朴欢快的民族舞步，展现了黔中大地百姓未经雕琢的淳朴。这种质朴恰是良知本真的状态。这向观众传达：阳明心学与贵州少数民族舞蹈的民间原生态在剧中浑然一体，将哲学与山河大地用肢体语言消解掉抽象性，王阳明在这片保留着本真的大地上，被人民的生活与自然的雄浑所唤醒。让观众从观剧中认同——贵州不仅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，更是阳明先生精神的涅槃场。

破解用舞蹈表达哲学的难题

将阳明心学的“知行合一”哲学概念搬上舞台，稍有不慎便会沦为枯燥的说教或标签化的符号堆砌。舞剧《王阳明》的显著特点，在于它破解了用舞蹈表达哲学的艺术难题。该剧没有依赖旁白或大量字幕去解释“心即理”，而是纯粹依靠肢体语言进行叙事与说理。剧中巧妙运用时空重叠的蒙太奇手法：青年王阳明“格竹”的困顿与中年王阳明贬谪途中的挣扎同台呈现，“格竹”舞蹈机械的质感，象征着心为行役，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向外求理的绝望与内心觉醒的迫切。与圣贤的时空对话，让观众感知心学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是积淀无数先贤智慧的结晶。

在《悟道》篇章中，舞蹈从先前的挣扎、压抑转为大开大合的舒展，通过肌肉的震颤与空间的调度，从韵律的动到极致的静，舞蹈展现出能量的辐射到戛然而止的雕塑感，加之音乐、灯光共同切割出“心”的空间，将龙场悟道那一瞬间的精神光束具象化为可感的舞台景观。这种处理让观众“看见”了思想，感受了阳明心学，为王阳明文化从书本走向大众提供了一条路径。

文艺精品的“文旅融合”探索

近年来，贵州坚持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促进文化旅游在更广范围、更深层次、更高水平深度融合，奋力打造高品质旅游目的地。舞剧《王阳明》通过走向高端平台、市场化巡演，成为了贵州文旅融合的一名“推销员”。

2024年11月至今，剧目不断推动全国巡演，跨越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南、福建、四川、青海、宁夏、陕西等10余省（区、市），20余座城市，演出69场。该剧不仅是艺术表演，也是贵州文化的流动展厅。通过演出，观众被剧中的喀斯特地貌景象、少数民族舞蹈和风情吸引，产生“跟着舞剧去贵州”的冲动。这种建立在审美基础上的认同，更令人向往。

此外，该剧在品牌联动上正在进行创新探索，通过与文创产品合作，实现“以舞传心，文创辅道”的跨界融合，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广受青睐，每到一处，认购如云。通过与旅游企业合作，推动贵州“心学之旅”，吸引游客从贵州的山水之旅向文化之旅升级，从“观形”向“走心”跃迁。这表明，通过激活文化资源撬动社会资本参与，形成“文化+商业”的良性互动，可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。

跨越代际与地域的文化传播

舞剧《王阳明》登陆国家大剧院、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重要平台，并在青年群体中实现“破圈”效应。数据显示，仅该剧全网曝光量超5000万次，短视频平台反响热烈。年轻人热衷于在社交平台讨论剧中“向死而生”的震撼，甚至将王阳明视为“困境中破局”的精神偶像。小红书上还有不少剧目话题，剧中王阳明、王阳明妻、少年王阳明、刘瑾等角色的扮演者都聚集了可观的粉丝群体，据后台数据观测，粉丝主要以“95后”“00后”为主。这表明传统文化一旦找到合适的现代表达，就能跨越代际鸿沟。舞剧《王阳明》受年轻人青睐，证明了贵州文化在青年群体的感召力。

舞剧《王阳明》是“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”的一个重要成果，演绎了如何将民族元素融入哲学叙事，并又一次启示我们：优秀艺术作品的根，必须扎在最深厚的土壤里。

舞剧《王阳明》朝着更高的艺术追求迈进，还需不断打磨提升。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复刻过去，而是让传统文化的心跳，与当代青年的血脉同频共振。

（作者系贵州省歌舞剧院党总支书记、董事）